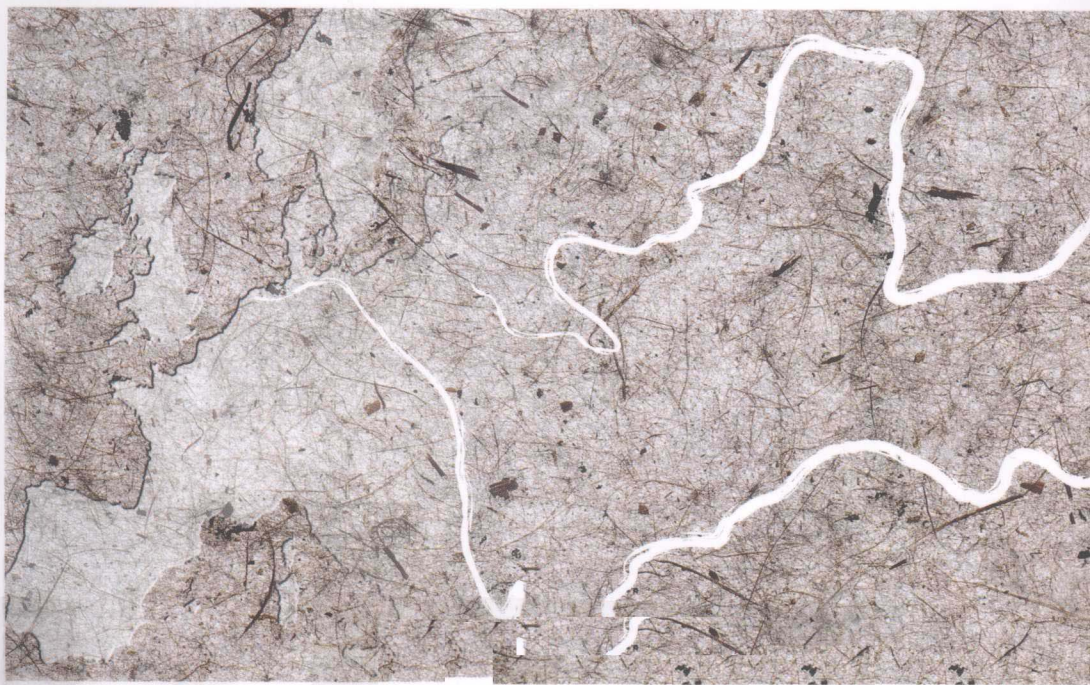


黄仁宇 著

现代中国的历程

The Road of Modern China



黄仁宇作品最新结集

以全球史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之路

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
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

——黄仁宇


 中华书局

黄仁宇 著

现代中国的历程

The Road of Modern China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的历程 / 黄仁宇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

ISBN 978 - 7 - 101 - 07892 - 3

I. 现… II. 黄… III. 中国历史 — 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044445 号

-
- 书 名 现代中国的历程
著 者 黄仁宇
责任编辑 徐卫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mailto: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½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892 - 3
定 价 32.00 元
-

出版说明

今日的中文阅读世界，如果要提出一位从学者、企业家等各界名流，到白领、高校学生等普通读者均赞誉有加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无疑是最热门人选之一。

1982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黄仁宇先生首部中文历史作品《万历十五年》，带给人们非常震撼的阅读体验，提供了思考社会与历史的另一个维度。这本书风行近三十年，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和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屡获佳评：《新周刊》《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中国图书商报》“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第九届深圳读书月“30年30本书”、2009年搜狐“读本好书”经典好书奖……

自《万历十五年》之后，黄仁宇先生的系列作品陆续在中国大陆出版，“黄仁宇旋风”成为中文读者的阅读盛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2006年8月、2007年1月，中华书局重新校订《万历十五年》，增补相关文字，分别推出《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和增订本，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短短数年印行近30万册，见证了黄仁宇作品长盛不衰的魅力。

目前大陆出版的黄仁宇作品，或号称“黄仁宇全集”，其实并非全璧。由于种种原因，黄仁宇先生尚有一些单篇论文及随笔散见于英

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报刊杂志，为大陆读者所不易搜寻。对于喜爱黄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读者朋友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有鉴于此，我们在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方途径搜集整理黄仁宇先生集外文字，编成一册，作为“特别的礼物”呈给众多的黄仁宇作品爱好者。黄仁宇先生曾坦言“我是自己雇用自己的记者，为一般读者大众而书写”，我们相信本书的形成亦算符合他的宗旨。

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一直是黄仁宇先生念兹在兹的关注主题。他说：“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我开始接触（历史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又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黄仁宇先生早年经历动荡，从军抗日，中年负笈美国，其间数十年遍游世界各地，考察先进国家进入现代化之程序，并反观中国取得突破之契机，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可鉴。在他的作品里，主张摒弃意识形态或道德上之争执，注重考察实情实事，“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体察历史发展的真实背景以及未来的真正趋向。本书辑录的文字也正体现了这一特色。是故，我们拟名为《现代中国的历程》，而且获得了黄培乐先生的首肯。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耿立群女史编纂的《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堪称编者搜寻黄仁宇先生作品的指路明灯；她还惠寄编辑部多篇黄仁宇文字的复印件，使本书得以成全。这是我们必须特别提出致谢的。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先生对本书的编辑也予以关心和支持，特此致谢。陈时龙先生翻译了《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16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明代的财政管理》、《中国社会的特质》四篇英文论文，在此致谢。编者需

要一一致谢的尚有：庄惠薰、洪丽珠、马昕、王瑞玲、李静、祝安顺、胡永华、余瑾等多位女士与先生，他们都在不同的方面促成了本书的问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编文字多发表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类报刊，其用字、表达习惯都跟如今不尽相同。编校过程中，一般不作统一修改，以保存原貌。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1年1月11日

目 录

出版说明	1
中国社会的特质	1
早期的统一与中央集权	3
农业社会的官僚政治管理	7
科学技术和货币经济的低水平发展	13
社会后果	18
欧洲过去和中国的未来	23
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	29
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	45
16 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	75
明代的财政管理	103
传统理财思想与措施的影响	104
户部及户部尚书	108
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116
1590 年前的财政管理	137
1590 年后的财政管理	146



结论	159
什么是资本主义?	165
当代论述资本主义的学派	165
资本主义的精神	167
布劳岱对中国经济史的解释	168
官僚体系的障碍	169
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170
法律与资本主义	172
资本主义的范围	173
资本主义的时空剖析	175
资本主义的条件	176
蒋介石	179
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187
站在历史的前端	231
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	235
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分野	235
台湾的机会与困境	237
中国历史的规律、节奏	239
关于蒋介石日记之二三事	243
中山舰事件	244
蒋介石的作风及性格	245

没有全盘计划的抗战策略	247
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阶段	248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	251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卷尾琐语	263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	267

中国社会的特质

——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①

李约瑟 黄仁宇^②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外国观察者相信，新的中国领导阶层将会与旧的传统完全决裂。今天，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革命的划时代效应已然清晰可见。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已经被纳入新的秩序之中。毫无疑问，这将会发挥巨大的影响，不仅会影响中国人自身的命运，而且会决定人类将来的命运。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历史延续性有时被视为是智慧引导的胜利。许多西方学者在中国人的共产主义、儒学、道教，甚至佛教之间找到了一些理论共同点。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很多，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证明。但是，这容易过分强调哲学家的影响，而弱化了具体的环境及经济因素的作用。

^① 本文最初为李约瑟博士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大学发表的演讲。两位作者对从与J. J. Broeze博士、C. Feinstein博士、Iain McPherson博士、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教授、米库拉什·泰希（Mikulas Teich）博士的讨论中所获得的帮助及对相关问题的澄清表示感谢。本篇载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东方文化》，12卷，1、2期合订，1974年。（译者按：此文先有戴开元先生的译文《中国社会的特征——一种技术性解释》，载见《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页278-309。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戴先生的译文，谨致谢忱。）

^② 剑桥大学凯斯学院（Caius College, Cambridge）。

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当然是一个可以进行不同诠释的主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多么强大，也不能掩盖其下还存在着气候、地理和社会融合等物质性力量这样的基本事实。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文明的历史，乃在于中国在公元前若干个世纪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于此种体制必然能够动员还只是相当原始的技术来支持，因而它也确实是一项很大的进步。然而，中国所达到的高度中央集权，并不是源于政治思想家们的想象，而是由环境造成的。地理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中央集权体制因为不得不持续地被加以完善并维系，使中国的政治和伦理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制度的发展，如多样化的经济制度、系统化的民事契约法、保护个人的司法体系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述的那些制度相对而言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反而确定无疑地被抑制，以免它们扰乱帝国的统一管理。结果，没有预想到的是，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中国官僚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源于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观。鼓励个人附属各类初级团体；然而，如果一种教导式的道德规范强调个人对他的同胞的义务，它也就抑制他所有的对于自然权利的诉求。过去 2000 年里，这些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传统中国社会中有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生长但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单纯而一致的民族文化概念、表意及单音节的语言（外国人很难学会）而形成的统一性、德治而非法治、中产阶级发展的缺失（这一点下面会提到），以及一直以来对商业利益和商业动机的抑制——一旦时机来临，所有这些都成了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要对中国今天所处的地位进行评价，我们的报告就必须首先对中国过去一些重大的发展情况进行探讨。

早期的统一与中央集权

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沿岸，的确意义非常重大。那条大河在大片的黄土层之间出入。由风吹来的沙土密集堆积而成的黄土层，厚度通常超过 300 英尺。结果，黄河的淤沙含量令人叹为观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河如果含沙量超过 4% 到 5%，就已经相当高了。然而，黄河河水的含沙量却曾经有过 46% 的观测纪录。它的一条支流的含沙量，则高达前所未闻的 63%。黄河河道的最后 500 英里，注入的支流不止一条。因此，黄河的河道经常淤塞，堤坝被冲溃，以至于今天黄河的河床要远远高出邻近的华北平原。

在帝制时代以前，各自修建的治水工程经常是彼此分开的封建国家之间发生纷争的原因，因为这类水利设施通常会给邻近的国家带来问题，并加剧祸害。早在公元前 651 年，相关的诸侯国就举行过一次联合大会。会议中，参与者们郑重承诺，决不改变黄河的河道，以免给其他国家造成麻烦。然而，承诺是无效的。随着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即公元前 5 世纪初至公元前 3 世纪末，争霸的诸国甚至会故意决堤，来淹灌敌对国的领土。直到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的出现，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这样，虽然一些人可能言之过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防洪、灌溉以及后来的散装运输所形成的对水利工程的需求，有利于帝国的统一。不仅如此，这一环境背景，同样还是解释为什么中国实行传统官僚制而非贵族制的最好理由之一。水利控制及其管理，总是会跨越封建诸侯领地的边界，而只有由一位君主及其各级官僚才能够掌控它。

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崛起于河谷流域的文明。埃及发源于尼罗河；巴比伦发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穆罕耶达罗（Mohenjodaro）文化发源于印度河。但是，所有这些都离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相

对较近，相互间的影响及征服也相当明显，而不像中国那样隔离于雄伟的青藏高原之外。青藏高原，自然而合适地孕育了以须弥山为中央山系的印度概念以及以昆仑山为中央山系的中国概念。为什么其他所有的古代河谷文明，都作为一个可以辨识的实体而消失，为后来的笈多、莫卧儿、罗马、拜占廷、伊斯兰文化所取代，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于任何试图寻求解答这一问题的人来说，这至少是部分的答案。

黄河及其泥沙造成了巨大的问题，而气候对中国也从不存善意。早期中国的作者们，由于没有现代气象学的帮助，理所当然地认为每6年就会有一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每12年会有一场大规模的饥荒。迄至1911年以前，历朝官修正史记载，在2117年中，洪灾不下1621次，旱灾不下1392次。平均下来，每年发生的灾害超过一次。只是到现在，我们才对这种现象作出充分的解释。

在中国，降雨的季节性很强。大约80%的降雨发生在夏季的3个月，而正在这个时间段，季风风向也发生改变。年降雨量的起伏也很大，因为中国的季风是受气旋影响，而不是受地形影响。换句话说，潮湿的季风并不借助高山来做它的冷却剂，而是依靠来自北方或东北方的冷气流。冷气流使潮湿的季风上升到足够的高度，从而增加其湿度。气流交汇的固定模式不会改变，但由于两种变量未必同步，故其实际效果逐年之间也就差异颇大。气流交汇的点可能要比预想的数量更多，或者数量更少。正是这种变化，导致中国频发水旱灾害——这是一种历史记录中常见的气象学现象，然而时至今日依然在发挥作用。有时候，两种自然灾害会在相同时间、不同地区内发生。

在公元前221年之前的数个世纪里，曾经历一系列血腥的内战。现存的记载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战争能够使得各国国君推行他们的强国计划，解决他们的私仇。但是，那些资料中留有足够的线索表明，自然灾害至少也要部分地为这种纷扰的状况负责。农民因为饥饿

和食品短缺而参加战争。庄稼被正在交战的军队掠夺。灾荒时节食品供应的中断构成开战的理由。而且，有能力分发救灾物资的大国必然能取得胜利；它们也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这样，一系列事件的连续发生，几乎自动产生了这一问题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目标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管理方式，从而能够独力调动所有必要的资源来缓解地区性灾害。

但是，大自然还给中国设置了另外一个难题，即北部边疆的安全问题。解决此一问题的方案，也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相关；长城的修建就绝妙地证明了这一点。以气象学的术语而言，长城这一条屏障，总体上与15英寸等雨量线一致。这清楚地表明，长城以南年降雨量能达到15英寸，而15英寸降雨量是谷物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雨量。在长城之外，降雨则更为稀少；大部分河流在入海之前即已干涸；游牧是主要的生存方式。拉铁摩尔把长城称作“世界上最纯粹的边疆之一”，认为它作为区分文化群落、社会风俗、语言、宗教的分界线存在了两千多年。由于对长城另一侧的少数民族的和平同化通常不会有持久的效果，北部边疆始终是中原农民与游牧部落之间冲突不断的区域。有时候，中国也会深入北部及西北的草原大漠，发起攻击，但每当它不这么做时，就只得对机动优势极强的游牧部落的入侵采取防御态势。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被起源于游牧部落的皇室所统治，是很常见的事情。实际上，元代和清代，整个国家都控制在蒙古人和满洲人之手。此处的情形，跟罗马帝国极为相似，但最后罗马干脆就被“蛮夷化”了，而中国却从未被“蛮夷化”。无论如何，军事动员及后勤保障都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国。这再一次证明，穿着制服的官僚所具有的动员力量，是贵族们想都不敢想的。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中国人的居住密度、农业种植的普遍性、内陆水网、居民语言的同质性，都有利于统一。这里也没有任何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过程中所不可克服的障碍。但是，与黄河水患的防治、连

续不断的救灾以及对边境游牧民族威胁的控制这些因素不同，中国在人文和社会地理的有利条件几乎没有加强统一问题上的迫切感。如果仅仅是这些条件，它们尽管也很可能会发展出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但步伐却会更慢，当然其基础可能也会更扎实。历史的进程和这种情况相距甚远。人们偶尔也会说，统一和中央集权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很快就诞生于中国。由于生存压力，统一化进程没有为地方性制度和习俗做法的成熟留出任何时间。贵族政治的特质也许能培育出地方性制度和习俗做法，而广泛推行的、注重效率和统一的官僚政治却不能。道家的技术和放任主义、墨家的科学和宗教、法家的讲求统一以及享乐主义者的自我修养，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因高度必要的中央集权的儒家官僚制国家而受到了伤害。帝制中国的权威之获得，是传承自两种资源：官僚制之前的诸侯国的体制结构、在这些诸侯国发展成熟的政治思想家们尤其是儒家的相关思想。

前面我们还提到其他古代伟大的河谷文明，而且，任何关于中国封建官僚制特征的讨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跟中国的官僚体制相比，为什么印度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印度同样遭受水旱灾害的侵扰；印度也受到威胁，主要是西北边境异族的入侵，而且在她漫长的历史中实际上也发生过多；印度也需要至关重要的水利工程，虽然除了南部的维查耶纳伽尔（Vijayanagar）王国以外，这些水利工程从未修缮到它们应该达到的程度。那么，导致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大部分其他文化如此不同的“未知因素”，究竟是什么？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刚才提到的那些“不紧迫的”因素才会显出其突出的重要性。在印度，语言、宗教和社会（等级）的多样化从很早时期就主宰着整个次大陆，与中国内部的同质性惊人地不同。中国人能将周边部族吸纳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例如越、蛮、契丹、女真），而不会削弱自己的文化，甚至还可以同化征服者，如蒙古人和满洲人，直到他们所有的可辨识特征孑然无存。不仅如此，中国还向整个东亚输出她的文化，以至于朝鲜、

日本和越南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她的子文化。确实，“单一的”表意语言在其中发挥了很大部分作用；深有特色的中国农业耕作方式及相应的技艺、多个世纪以来培养得越发合适的中国官僚行政管理的特定程序，也都起着很大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具有等级特征的制度；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不能高于一切、让人服从，或者享有世俗权力，这两点也非常重要。

在历史悠久性方面，唯一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其他文明，应该是尼罗河边的古埃及文明。埃及还曾流行过同质性的表意语言。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当然，中国和埃及之间也有差异。埃及的存在确实比中国更早，因为当中国的商王朝开始之时，埃及法老的机构已存在了2000多年。然而，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胜利1500年之后，统一的中国在今天依然是现实的存在。中国幅员辽阔，其河流、群山、平原可以在相当于欧洲大小的区域内延伸；与此十分不同的是，埃及则被条形区域两侧的沙漠限制得非常狭窄。这样一来，为什么中国的经验与任何其他的河谷文明不同，理解起来也许就不太困难了。

农业社会的官僚政治管理

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农业国家里，她所形成的组织严密的官僚政治工具，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领取全额薪水的专业管理群体，把行政官职视为等级秩序内完全可以互换之物。这就极大地要求标准化和精确度，从而也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赋税所征物品的大规模运输意味着薪水和地方开支通常都是在源头处扣除，而不是在京城支取，从而导致各层面无休止的侵吞贪污倾向；其次，通用型地方官员的可以互换之原则，意味着专业人才（水利工程师、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总是被搁置一边而很少能身居高职。由于官员们并不代表他们所治理的省份或地区的财政利益，政府并不依靠地区财政

利益的平衡而达到稳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只在于它们共同屈服于帝制统治之下。中央政府似乎是，也的确是唯一的权力源泉。然而，由于国家太过庞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并非总能有效运行。

在中国统一的早期阶段，上述需求及状况派生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为了帮助行政管理者的工作，就有了法典的制作。虽然如此，但总体来说，这些法律制度回避了罗马法的法律抽象特征，而每件案子的审判都会综合考虑社会环境，不会排除那些看来可能无关的因素。既然传统中国的法律总是首先关注刑法，所以辩护律师制度也就没有发展起来。然而，由于最优秀的中国官员中有人如此热衷于司法，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最古老的法医学著作就产生在中国，例如宋慈在1247年编纂的《洗冤录》（意思是洗雪不公正罪名之记录）。随着王朝的更迭，军事政权转变成成为文官政府，控制也小有松弛，行政纪律很快得到重建。大体上来说，转而忠诚于一个通过武力建立新王朝并且声称自己得到“天命”的统治家族，成了士人们的习惯。通常，政府声称自己的目标就是道德教化，而且公共教育则被动员起来加强它的地位。

然而，所有这些特征尽管重要，却并不能够弥补因缺乏充分的交通、通讯、金融信贷、会计方法、信息收集、资料分析等技术支持所带来的不足；这些技术，是任何一种现代官僚管理都不可或缺的。这并不是说，传统中国没有保存档案，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统计。实际上这些事情都做过。然而，尽管设有史馆，大臣们也都有幕僚，但中国的政府机构距离它必须以之为基础的技术还是太遥远了。人们记得，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每天要阅读大量的简牍文书；人们也会记得，因此而必定会造成官方决策十分迟缓，这种情况延续了一个又一个世纪。

结果，在官僚管理体制发展史中，中国遵循着“进三步，退两步”的模式。这样进退维谷的处境表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会形成太多的重压和紧张，任何地方分权都可能开始一场使得统一政府瓦解